

# 明清省会书院的财产经营研究\*

赵 伟\*\*

- 一、明代省会书院“置田收租”的经费模式
- 二、清初顺治、康熙间督抚建设的省会书院
- 三、雍正朝耗羨归公财政改革与省会书院建设
- 四、雍正十一年省会书院制度确立后的财产经营方式
- 五、余论:19世纪借助省会书院制度推行的教育变革

## 【中文摘要】

中国书院发展至明清时期,财产经营方式逐渐发生新的变化。明代由省级官员建设的省会书院属于地方自发设立,难以得到来自中央或地方政府稳定的财政经费支持,因此其财产经营延续了宋元以来传统的学田经费模式,通过置办学田来获取稳定的地租收入。清代雍正朝实施“耗羨归公”财政改革以及正式颁行省会书院制度后,各省有了自行支配的公项经费用于公共开支,省会书院成为地方经费的支出之项,其经费结构走向多元,财产经营方式也发生新的变化,学田经费模式走向式微,资本放贷生息成为主要来源。从此,省会书院的经费更加充裕,确立了一省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为19世纪的教育体制变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省会书院, 财产经营, 教育经费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19S1A5C2A02082813).

\*\*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zhaowei960@qq.com)

【국문초록】

## 명청(明清) 시기 성회(省會)서원의 재정 경영 연구

조위(趙偉)\*

중국 서원은 명청 시기까지 발전을 이루면서 그 재정 경영 방식 또한 새로운 발전을 거듭하였다. 명대 성급(省級) 관원들이 건설한 성회 서원은 지방에서 자발적으로 설립한 유형에 속하며, 중앙, 지방 정부로부터 안정적인 재정 경비 지원을 획득하기 어려웠다. 이 때문에 그 재정 경영은 송(宋), 원(元) 이래로 전통적인 학전(學田) 경비 양식을 지속하였으며, 학전 설치를 통해 안정적인 조세 수입을 거두고 있었다. 청대 옹정(雍正) 연간에 '모선귀공(耗羨歸公)'이라 불리는 재정 개혁 및 성회 서원 제도의 정식 시행 공포가 이루어진 후, 각 성에서는 스스로 관리하는 공동 경비를 공공 지출에 운용하게 되었다. 성회 서원은 지방 경비 지출 대상이 되었으며, 그 경비 구조가 다양해지면서 재산 경영 방식도 변화를 이루었다. 학전 경비 양식은 점점 미약해졌고, 자본 대출 이윤이 그 주요 경비 재원이 되었다. 이에 의해, 성회 서원의 경비는 더욱 풍족해졌으며, 이에 한 성의 문화 교육의 중심지로서의 지위를 확립하게 되었다. 나아가 19세기 교육 체제 개혁에 기초를 마련하였다.

주제어 : 명청(明清), 성회(省會) 서원, 재정 경영, 교육 경비, 교육 제도

---

\* 남창대학인문학원력사계강사(zhaowei960@qq.com)

省会书院是明清时期地方大吏在省会建立、主持,以招收通省士子肄业为主要特征的官办高等级书院。研究者根据这一性质,又将其概述为“省级书院”。<sup>1</sup>省会书院始见于明代,原是各直省提学官为扭转官学积弊而自发建立,其后督抚、两司、巡按等官员亦加入建设,使得省会书院建设形成潮流。清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正式对这一制度加以认可,谕令各省普遍设立,省会书院正式成为国家教育体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近代以前省级政府施行、扩展其教育职能的直接体现。

书院无论是官立、私立或是官民公立,经费是其各项建设的前提基础。明清省会书院经费的筹措、管理、营运方式一方面对宋元以来传统的书院建设模式有所继承,另一方面还受制于明清财政经费体制,在朝廷令甲与地方需求之间探索应对,在财产的经营问题上形成了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同时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新组织模式,反映出早期省办教育事业丰富的运行实践。

## 一、明代省会书院“置田收租”的经费模式

明代是省会书院制度的初创期。明中叶以来,随着官学制度的废弛,朝廷设立提督学校官以期扭转积弊,设立省会书院就是提学官重要的兴学举措。在各省提学官自发的努力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省会书院制度。<sup>2</sup>万历三年(1575),针对提学官愈来愈多的聚徒讲学行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学政制度改革,以更换提学敕谕的方式命令提学官“不许别创书院”。<sup>3</sup>提学官的书院建设因此

1 陈谷嘉(1997),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第90-103页。

2 有关明代提学官的书院建设,参见赵伟、邓洪波:《明天提学官的书院建设与张居正的学政改革》,《学术研究》,2021年第5期。

3 (明)张居正:《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明)张居正撰,吴量愷、崔曙庭、李国祥校注:《张居正集》第1册,第174页。

遭受打击，督抚在明清之际逐渐取代提学官而成为省会书院的主要建设者。<sup>4</sup> 此为明代省会书院发展之大势。

明代省会书院集中出现在成化、弘治以后，详细信息见表1。

〈表 1〉明代省会书院及其经费来源<sup>5</sup>

地区		书院	创建、 复建时间	修建者	经费来源	
					营建经费	常规经费
南直隶	应天府	崇正书院	约嘉靖四十一年创建	提学耿定向		
山西	太原府	河汾书院 (又名晋阳书院、三立书院)	嘉靖十年重建	提学陈讲	初建: 帑贖金、羨余、民间输资	房产租息每年50两; 学田百余顷, 得谷800余斛, 粟50斛
					重建: 贖金、帑银、奇羨、考试支剩银、巡抚幕府市租、晋王捐银、岁考长物	学田3顷59亩
山东	济南府	湖南书院 (又名至道书院)	约嘉靖十四年创建	巡抚蔡经	改创寺庙	学田120顷
		历山书院	万历四十二年创建	巡盐御史毕懋康	贖鍰	斥鍰百缗, 置膳田若干亩
陕西	西安府	正学书院	弘治九年创建	提学杨一清		学田49顷
河南	开封府	大梁书院	成化十五年重建	提学吴伯通	官民捐资	学田
浙江	杭州府	万松书院	弘治十一年创建	右参政周木	改创寺庙	学田

4 详见赵伟：《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研究(1644-1850)》，湖南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5-52页。

5 参考文献(从简，下同)：(明)耿定向《耿定向集》；(明)袁继咸编，(清)刘梅、和其衷续编《三立祠传》；(明)唐鹤征《皇明辅世编》；崇祯《历山县志》；嘉靖《雍大记》；(明)李梦阳《空同集》；(明)吴伯通《石谷达意稿》；(明)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明)许弘纲《群玉山房文集》；(明)岳和声《共学书院志》；(明)魏校《庄渠遗书》；雍正《广西通志》；(明)陆深《俨山集》；嘉靖《贵州通志》。

福建	福州府	五经书院	约嘉靖间创建	不详		
		共学院	万历二十二年创建	巡抚许孚远、提学徐即登	纸札赎醵诸费	学田数百亩，租银数百两；岳和声增置学田数百亩；陈长祚捐250.544亩，征租380余石
广东	广州府	崇正书院	约嘉靖元年创建	提学魏校		
广西	桂林府	宣成书院	弘治十八年重建	提学姚镛	各官捐资	学田110亩，另有祭田30亩；官学田租
四川	成都府	大益书院	正德十三年创建	提学王廷相	各官捐资	学田租收460余石
贵州	贵阳府	文明书院	弘治十八年创建	提学毛科	官帑	
		正学书院	嘉靖二十一年创建	提学蒋信	各官捐资	
云南	云南府	五华书院	嘉靖三年创建	巡抚王启		学田

以上15所书院分布在12个省直区域，仅有北直隶、湖广、江西未见省会书院建设的确切记载。可以认为，省会书院在明代已经广泛分布，作为一种新的办学形式被普遍接受。

纵观明代的省会书院建设，许多主持者都会声称“不动官钱，不费民财”<sup>6</sup>，但从表1的统计可以看出，多数省会书院仍然动用了地方经费来营建、维持。其中，官员捐资及赎金、奇羨等地方非正式经费是营建书院的主要经费来源，仅有文明书院及三立书院接受过藩司钱粮的资助，<sup>7</sup>明确记载得到民间捐赠的只有河汾书院及河南提学吴伯通的书院网络营建计划。<sup>8</sup>常规经费的筹措，

6 (明)吴伯通：《河南提督学校条约》，《石谷达意稿》卷32，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一年刻本，第8a-8b页。

7 弘治十八年(1505)，贵州提学副使毛科建文明书院，动用了藩司附收的学校经费。万历二十一年(1593)，山西巡抚魏允贞重建三立书院，由布政使“括堪动帑银并己所节缩奇羨二伯醵，考试支剩银一伯九十醵”并各官捐资营建而成。分别见(明)毛科：《提学道记》，赵平略、吴家宽、徐万洁点校：《嘉靖贵州通志》上册，第252-253页；(明)王道行：《创建三立祠碑记》，(明)袁继咸编，(清)刘梅、和其袁续编：《三立祠传》卷上，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嘉庆二十三年刻本，第1a-1b页。

8 成化间吴伯通的书院营建经费来自“致事士夫并殷实学户及冠带义官、义民”的捐资，嘉靖十年(1531)河汾书院亦接受“闾阎好义之士”的资助。分别见(明)吴伯

亦多来自各官捐俸、动支官银或拨置官产，利用方式有直接拨给和置办学田两种。每年直接拨给官银的书院不多，广西提学王宗沐主持的宣成书院是其一例。王宗沐规定，宣成书院从江西礼聘《易》《书》《诗》三经教读，“动支学租银两，每生聘礼银四十两”。《春秋》《礼记》二经教读，“悉听本府动支学租银两供用，填注循环簿内报院”。肄业生员有薪烛银，其数按道里远近给予有差。<sup>9</sup>绝大多数书院采取的是传统的置田收租经费模式。

传统书院“率以官田租项为经费”<sup>10</sup>，随之形成具有长久历史影响的书院学田经费模式。如宋代“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自创建以后，由潭州太守李允则辟水田供春秋释奠，“由此开创了岳麓的学田建设”。<sup>11</sup>这种置田收租的经费模式在明代的省会书院建设中得到延续。李梦阳在《大梁书院田碑》中就认为学田是宋代四大书院得以兴盛的重要支撑：“赵宋之肇也，睢阳、石鼓、岳麓、白鹿四者，其巨矣，然必田焉。”<sup>12</sup>在明代“书院非制”的环境下，为使地方自发建设的省会书院长久维持而不至于“人走政息”，置办学田以使书院得到稳定的经费来源得到书院建设者青睐。

然而，学田经费模式也存在风险，若经营不善，或“岁久并于豪强”<sup>13</sup>，或为胥吏干没。为此，省会书院建设者采取了多种办法以避免各种流弊。最常见的就是明确管理责任，将学田委任官员董理。福建共学书院推陈出新，采取了三项措施以防“侵隐”。

通：《河南提督学校条约》，《石谷达意稿》卷32，第8a页；（明）唐龙：《河汾书院记》，（明）袁继咸编，（清）刘梅、和其衷续编：《三立祠传》附卷，第1a-2b页。

9 （明）王宗沐（1995），《作新桂林书院呈》，《敬所王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1册，济南：齐鲁书社，第588页。

10 （清）梁廷枏（2018），《越华纪略》，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第83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289页。

11 朱汉民·邓洪波（2017），《岳麓书院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第19页。

12 （明）李梦阳：《大梁书院田碑》，《空同集》卷40，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一年刻本，第9b页。

13 （明）陈伯献（1967），《重修宣城书院立田记略》，嘉庆《临桂县志》卷14，台北：成文出版社，第227页。

其一是在学田管理上, 设置了“权在有司, 支由学职, 而绾握又在贤绅”<sup>14</sup>的分权相维之法。共学书院经费由轮值教官负责统计, 乡绅负责复查, 每季由主铎与三学教官结算之后, “学道及府正、刑馆、两县五处”<sup>15</sup>最终复核, 可谓分工细致, 管理严密。总体来看, 明代民间力量参与省会书院管理的例子极为罕见, 共学书院允许乡绅参与经费的管理, 打破了省会书院完全的官办官管性质, 通过书院公共属性的提高来维持其制度经久不坏。

其二是将清丈书院田亩等数据“刻图开载明白, 一样六册”, 交官府存照, 永为遵守。同时, 还纂修书院专志《共学书院志》, 将“院地丈数”详细开载, 以便后续查考。<sup>16</sup>

其三是单独设立“共学书院”户头征取租赋: “今将先后所买田地等项, 俱以共学书院名立为一户, 如闽县应收者, 即立共学户于闽县某里某图某户内。各县亦然。如此, 书院田租征收有名, 亦便官府藉此考成各属, 防止欺隐。”<sup>17</sup>

主要依赖学田租收作为经费来源的省会书院, 每年常规经费总数能达到怎样的规模? 在万历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改革以前, 各书院田租的征收以实物为主。山西河汾书院在嘉靖间有学田百余顷, 每年得谷800余斛, 粟50斛。明制, “五斗曰斛, 十斗曰石”<sup>18</sup>, 学田租收可折算为谷400余石, 粟25石。同一时期, 四川大益书院学田每岁可得学租460石, 与河汾书院学田收入相埒。相较于一般书院而言, 明代省会书院的经费收入已非常可观。集河南“三府一十八处”共修的辉县百泉书院, 在同期共有学田4顷, “每亩岁收粒钱三十文”, 每年仅能征收12000文。

“一条鞭法”改革以后, 省会书院学田租收有改为以银两计算征收者, 但由

14 (明)岳和声(1995), 《设置讲课簿由》, 《共学书院志》, 《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第251页。

15 (明)岳和声: 《设置讲课簿由》, 《共学书院志》, 第251页。

16 (明)岳和声: 《善后》, 《共学书院志》, 第257页。

17 (明)岳和声: 《善后》, 《共学书院志》, 第257页。

18 (明)张自烈编(1996), (清)廖文英补: 《正字通》,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第448页。

于相关史料的缺乏, 所收租银数量仅能在有限范围内作出一些推测. 以资料较全的福建共书院为例, 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创建以来由地方大吏增置学田“数百亩”, 可收租银“数百两”.<sup>19</sup> 万历四十六年(1618), 提学岳和声复置田数百亩, 缴纳学租数量不详. 乡绅陈长祚捐田250.544亩, 可征租380余石.<sup>20</sup> 以上合计估算, 共书院每岁收入当在数百至千两上下. 汇聚一省财力办学的省会书院在经费上形成区别于普通书院的优势, 为其一省文化教育重镇的身份奠定了经费基础.

## 二、清初顺治、康熙间督抚建设的省会书院

清承明制, 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学系统. 书院在经历了明清之际战火的影响后迅速恢复发展, 但仍未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 明代后期经张居正改革而形成的“万历学政体制”在清初得以延续, “不许别创书院”仍是提学官履职时需要遵守的条款.<sup>21</sup> 在这项政策的影响下, 在明代作为省会书院主要建设者的提学官(在清代习称“学政”)渐次退出, 督抚代替其角色成为省会书院的主要建设者.

明代所建的不少省会书院历经战乱在清初继续存留, 并在督抚等官员的支持下相继恢复办学. 除恢复旧院外, 新省会书院于顺治、康熙间次第修建. 另有部分书院始建于前代, 但在清初得益于新行省制度的实施, 得到了省会书院身份.<sup>22</sup> 如长沙府在清初湖广分省后成为湖南省会, 岳麓书院随之成为湖

19 (明)岳和声:《宦绩》,《共书院志》,第171页.

20 (明)陈长祚:《义助书院会田记》,(明)岳和声:《共书院志》,第218页.

21 (清)素尔讷等纂修(2009),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94页.

22 有关清初省制的变革情况,见傅林祥:《从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规



南省会书院。清初创建、恢复的省会书院，详见表2。

〈表 2〉清顺治、康熙间创建、恢复的省会书院<sup>23</sup>

地址		书院	创建、重建时间	修建者	经费来源	
					营建经费	常规经费
山西	太原府	三立书院	顺治十七年重建	巡抚白如梅		
陕西	西安府	正学书院	康熙初重建	巡抚贾汉复		
		关中书院	康熙三年重建	巡抚贾汉复		
河南	开封府	大梁书院	康熙十二年重建	巡抚佟凤彩		学田
		游梁书院	顺治十二年重建	提学张天植		
山东	济南府	历山书院	约顺治十年重建	布政使张缙彦		
江苏	江宁府	虹桥书院	康熙二十一年创建	总督于成龙		官员捐资
	苏州府	紫阳书院	康熙五十三年创建	巡抚张伯行	拆寺庙材木	学田3.07525顷
安徽	安庆府	培原书院	顺治九年创建	操江巡抚李日芄	官员捐资	学田、官学田租
江西	南昌府	豫章书院	康熙三十一年重建	巡抚马如龙		官员捐资
浙江	杭州府	敷文书院	康熙十年重修	巡抚范承谟		学田
湖北	武昌府	江汉书院	顺治十二年重建	右布政张尔素、 左布政黄志遴		官员捐资
湖南	长沙府	岳麓书院	顺治九年重建	巡抚彭禹峰	官民捐资	学田300余亩
福建	福州府	共学书院	康熙二十四年重建	总督王国安	各官捐俸	
		鳌峰书院	康熙四十六年创建	巡抚张伯行	官员捐俸	学田、房租、余 羨银等
广西	桂林府	宣成书院	康熙二十一年重建	教授高熊征	各官捐资	官学田租、鱼塘
四川	成都府	锦江书院	康熙四十三年创建	按察使刘德芳	官员捐俸	官员捐资
贵州	贵阳府	阳明书院	康熙十二年重建	巡抚曹申吉	官员捐资	官员捐资

23 参考文献：(明)袁继咸编，(清)刘梅、和其衷续编《三立祠传》；乾隆《西安府志》；雍正《河南通志》；道光《济南府志》；乾隆《江南通志》；(清)张伯行《张清恪公年谱》；道光《怀宁县志》；光绪《江西通志》；(清)李绂《穆堂别稿》；(清)魏颂唐《敷文书院志略》；康熙《湖广武昌府志》；民国《湖北通志》；(明)吴道行、(清)赵宁等修纂，邓洪波、杨代春等校点《岳麓书院志》；乾隆《福建通志》；(清)游光绎《鳌峰书院志》；嘉庆《广西通志》；(清)李承熙《锦江书院纪略》；道光《贵阳府志》。

以上18所省会书院分布在14个省份,在地方大吏的主持下,重修了讲堂、号舍、庖湍、门垣等建筑遗产,集通省选拔之士肄业其中。

清初省会书院作为国家教育体制之外地方自发建设的公共工程,基本得不到正项钱粮的资助,其经费有赖于地方官员在正常的经费体系之外另行筹措。从顺治到康熙,省会书院经费的筹措办法基本未能摆脱官员捐资与置田收租两项举措之外,详见表2。与明代相比,清初的省会书院建设仍有民力参与,如岳麓书院是官员及“七郡士绅输助”<sup>24</sup>而成,但此类事例仍属罕见,官力仍占据支配地位。

这一时期省会书院的常规经费以置田收租为主,间有官员捐资以供馆谷,少数书院还有房产收取房租,这些经费筹措方式基本与明代无异。值得注意的是鳌峰书院,其创建者张伯行在学田租收及房租以外,还拨福安县富溪津牙税每年羨余银,<sup>25</sup>属于将地方耗羨经费固定化为书院经费的尝试。这种经费筹措方式在当时并不多见,但是在雍正以后逐渐普及。

总体来看,清初省会书院仍然处于不稳定发展状态,多随着个别热心文教官员的去留而盛衰不定。为了改变这种不稳定状态,部分督抚采取了两方面措施来为省会书院谋求稳定的发展环境。其一是经济措施,即置办学田以使书院拥有稳定经济来源的传统方式,这在本质上与明代并无太大差异,无需过多赘述。其二是政治措施,通过疏请于朝来争取皇权的正式认可。康熙间获得皇帝赐额的省会书院有岳麓书院、游梁书院、白雪书院、敷文书院、鳌峰书院、大梁书院、豫章书院。<sup>26</sup>这显示,地方的省会书院建设已经得到朝廷关注,长期处于“非制”状态的省会书院得到了皇权的认可。

24 (明)吴道行(2012), (清)赵宁等修纂, 邓洪波、杨代春等校点:《岳麓书院志》,长沙:岳麓书社,第429页。

25 (清)游光绛:《鳌峰书院志》,《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第284-285页。

26 邓洪波(2012),《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456页。

### 三、雍正朝耗羨归公财政改革与省会书院建设

雍正朝是清代书院发展史的关键阶段，雍正帝多次介入地方的书院建设。然而，受制于清初的财政经费体系，各省的省会书院建设长期无法得到财政支持。是期，存留各省的地方经费严重不足，地方政府因此演化出一套由捐献、捐俸、陋规、耗羨、赢余等内容构成的所谓“非正式经费体系”。<sup>27</sup>由于这类非正式经费并未受到法令的正式认可，即便是督抚拨给书院的经费，也难以设立专项存案而得到继任官员的奉行，缺乏稳定的制度保证。显然，旧有的地方财政经费体系无法为书院提供持久稳定的收入来源。书院欲合理合法使用地方经费，有赖于地方经费体系的革新，而雍正帝继位后推行的耗羨归公财政改革恰好满足了这一要求。

“耗羨”泛指地方广泛存在的各类名目的加派，这类收入或明或暗的存在于地方各级衙门，以一种非正式经费的身份支撑地方事务的开展。雍正帝继位后，将各省征收耗羨的行为合理化，为地方提供养廉银与公费银，供地方衙门内外开支之用。<sup>28</sup>经此改革，各省有了自由支配的公项经费，供应一省的公共开支，书院合理合法地接受非正式经费资助成为可能。此后，以耗羨经费资助书院的事例愈加频繁，省会书院经费体系随之产生了两个重要变化。

一是经费总额大幅提高。雍正二至三年(1724-1725)李绂巡抚广西，从茶果银项下拨给省会宣成书院修理书院、置办器具、师生供给、覆试盘费、课士奖励、购买书籍及编印省志的经费达到4025两，这是依赖个人捐资难以达到的数字。

二是书院经费出现新的经营方式，以抗拒依靠官员个人筹款、拨给耗羨带来的不稳定风险。与耗羨归公几乎同期推进的发商生息制度(又称生息银

27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2020)，《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1-79页。

28 [美]曾小萍著，董建中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第83页。

两制度)稳固化进程,是雍正朝财政经费制度的又一项重要变化。如果说耗羨归公后各省拥有了对公项经费的使用权,那么雍正朝对生息银两制度的整顿使各省拥有了对公项经费的经营权。发商生息,意即官府将一定的货币资本(一般是银两)交给拥有足够实力的商人承领,按一定的利率在固定的期限收取利息,供官府各项公务之用。而省会书院建设即是这类“公益或公务”的一个项目,其经费随之出现发商生息的新营运方式。最早将之运用到省会书院建设的是广东总督郝玉麟。雍正十年(1732),郝玉麟修葺肇庆天章书院(后改名“端溪”),奏请拨给盐政赢余2000两,以2分利发商生息,作为书院的日常经费。<sup>29</sup>

随着耗羨及生息银两成为省会书院新的经费来源,为进一步完善、建构新的省会书院制度提供了经济制度基础。

#### 四、雍正十一年省会书院制度确立后的财产经营方式

##### 1. 雍正十一年获赐帑金的使用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在确定书院之制不碍其“崇实黜虚”的政治理念后,正式下令各省建立省会书院。上谕略曰:

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着该督抚商酌举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豫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封疆大臣等并有化导士子之职,各宜殚心奉行,黜浮崇实,以广国家菁莪棫朴之化。<sup>30</sup>

29 (清)黄登瀛(2019),《端溪书院志略》,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第9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第20页。

30 《世宗宪皇帝实录(二)》卷127,雍正十一年正月壬辰,《清实录》第8册,北京:

地方督抚遵照谕旨, 各省省会书院次第建立, 形成“一省一院”和“一省两院”两种模式。“一省一院”者为:直隶省莲池书院、山东省泮源书院、山西省晋阳书院、河南省大梁书院、陕西省关中书院、甘肃省兰山书院、湖北省江汉书院、湖南省岳麓书院、安徽省培原书院(后改名为敬敷书院)、江西省豫章书院、浙江省敷文书院、福建省鳌峰书院、广西省秀峰书院、四川省锦江书院、贵州省贵山书院、云南省五华书院。“一省两院”者为:江苏省江宁府钟山书院、苏州府紫阳书院、广东省肇庆府端溪书院、广州府粤秀书院<sup>31</sup>

这20所奉旨所建的省会书院的规制必须严格遵照雍正帝谕旨中的设计, 其中涉及经费的规定最为关键, 即谕令督抚从各省藩库存留的地丁银内提取1000两作为经费,<sup>32</sup>不足者, 准其动支存公之项。这属于明清以来省会书院制度中的首创。藩库帑金并非每年拨给, 各省督抚需要以此为基础, “预为筹划”, 为书院谋取久远之策, 其措施不外置田收租与发商生息两端。

据统计, 将帑金用于置田的书院有7所, 分别为:直隶莲池书院、江苏紫阳书院、江西豫章书院、安徽敬敷书院、广西秀峰书院、云南五华书院、贵州贵山书院。<sup>33</sup>将帑金发商生息的书院有12所, 分别为:山东泮源书院、山西

中华书局, 1985-1987年, 第666页。

31 按:嘉庆《大清会典》记载了21所省会书院名录, 其中, 湖南城南书院、广西宣成书院、奉天沈阳书院并非雍正十一年所设, 另遗漏江苏紫阳书院、安徽培原书院。城南书院见刘艳伟:《城南书院非雍正年间所设省会书院考》;宣成书院见(清)金鉉:《奏为遵旨举行书院筹划垂久事》, 雍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台北故宫藏档案, 档号:402015621;紫阳书院见(清)杨永斌:《奏请动支关规银交盐商生息接济书院经费及捕盗银事》, 乾隆三年二月初八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档号:04-01-35-0883-035;培原书院见乾隆《江南通志》卷90《学校》,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9册,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年, 第531页。

32 (清)梁廷枏:《粤秀书院志》, 《中国历代书院志》第3册, 第40页。

33 参考文献:(清)张鸣钧《奏为直省书院膏火经费不敷请旨酌添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 档号:04-01-38-0180-022;同治《苏州府志》;(清)刁承祖《奏报筹设书院事折》, 台北故宫藏档案, 档号:402003475;乾隆《南昌县志》;乾隆《江南通志》;乾隆《贵州通志》;(清)德隆《奏请颁发御制诗文全部并办理书院膳田等事具奏》, 台北故宫藏档案, 档号:27861。

晋阳书院、陕西关中书院、河南大梁书院、甘肃兰山书院、湖北江汉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苏钟山书院、广东端溪书院、广东粤秀书院、浙江敷文书院、福建鳌峰书院。<sup>34</sup>另有1所省会书院(四川锦江书院)因缺乏史料而无法作出进一步判断。

可见,发商生息以资膏火是多数省会书院对帑金的利用方式。这12所书院依据各省情形,交付当、盐、茶商承领,每月以1分至2分生息,遇闰则加增1月,每年得利银120~480两不等。而置办学田的书院,受地域、年节的限制,所置学田的数量有较大差异。其学田租收,有的以实物计算,如江西豫章书院以帑金置办学田240余亩(一说279亩零),岁收租谷310余石;有的以银两计算,如直隶莲池书院以帑金置田8顷97亩4分零,岁收租银150余两,在数量上并无明显优势。

## 2. 发商生息经费模式的普及

从后续情况来看,雍正帝赐给省会书院的1000两帑金远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直隶布政使张鸣钧在乾隆元年(1736)估计,省会莲池书院生徒“每名每月需银一两二钱,统计百名,每年约需银一千四百四十余两,加以延师修脯,每年必得一千六百余两,方敷用度。今查所置学田仅收租资一百五十余两。”<sup>35</sup>各

34 参考文献:(清)海宁《晋政辑要》;(清)缪荃孙《泲源小志》;(清)毕沅《奏请将兴平等县征解地租充公银两拨入关中书院以充膏火等费事》,台北故宫藏档案,档号:403043751;(清)元展成《奏请将平余银两留充书院经费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04-01-35-0883-032;(清)钟保《为建立书院育乐人才而振文风事》,台北故宫藏档案,档号:402015009;(清)杨廷璋、庄有恭《为酌议浙省停止公项银两交商生息事奏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04-01-38-0182-030;(清)游光绎《鳌峰书院志》;(清)江南司《奏为查明除江宁钟山书院及徽州紫阳书院生息银两外别无营运之案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03-0702-034;(清)鄂弥达、杨永斌《遵旨在省会之地建立书院事宜事》,台北故宫档案,档号:402014568。

35 (清)张鸣钧:《奏为直省书院膏火经费不敷请旨酌添事》,乾隆元年二月十八日,

省会书院无论是利用帑金置田收租,还是发商生息,所获银两都不敷使用。因此,各省会书院在处置帑金的同时,不得不采取多种方式谋求扩大经费收入。

总体而言,各省为省会书院筹措经费的方式大致有直接拨给公项银、借公项银发商生息、提用书院余存款项、官员捐给养廉银、拨置学田、再请皇帝赐给帑金、拨给充公资产、社会捐助八种。其中置田收租与接受社会捐助是书院传统的经费来源,而拨给公项、捐廉、生息、提用余款、赐帑则是在雍正以后伴随着新财政制度改革而诞生的新举措。各省在筹措省会书院经费时,在这种“旧传统”与“新模式”之间会如何取舍?

统计显示,在一定历史时期将学田租收作为主要经费来源(50%以上)的省会书院有粤秀、秀峰、宣成、五华、关中、敷文、莲池7所书院。其中,秀峰、宣成、敷文、莲池书院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因其他经费收入的增加而使得学田租收下降到一半以下,实际上长期依赖学田租收的书院仅有粤秀、五华和关中书院3所。其余省会书院的学田租收皆在一半以下,甚至还出现了几乎不依赖学田收入的书院,如山西晋阳、山东泲源、甘肃兰山、湖北江汉书院,其经费基本来自生息银、捐廉和公项银两。<sup>36</sup>因篇幅所限,举莲池书院以为证明。

雍正十一年(1733),直隶总督李卫将所赐帑金置买学田8顷97.4亩,岁收租银150余两。李卫又捐养廉银1千两购置磁州水旱稻地5顷2.8亩,岁收租银140-150两。两项合计未及300两。乾隆元年(1736),莲池书院每岁需银1600余两,李卫复拨工部侍郎王钧出资营成丰霸二处稻田100顷14亩田租增添膏火。此项田租共银2千两上下,以其1300两给予莲池,余剩银两拨给普济堂。<sup>37</sup>然而到二年、三年(1737、1738),这百余顷田被水冲毁,收租无几,无法支给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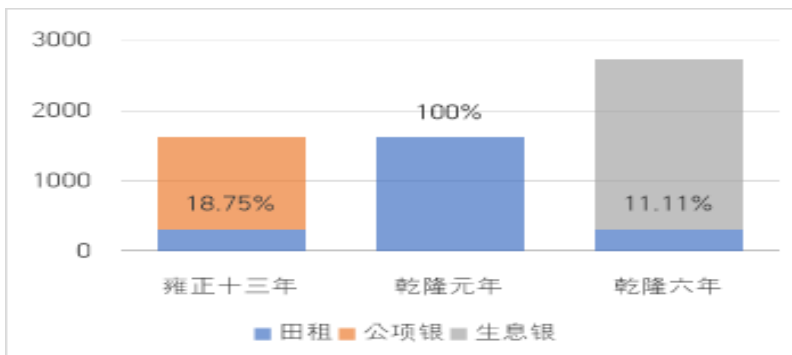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04-01-38-0180-022.

36 各省会书院的经费结构,详见赵伟:《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研究(1644-1850)》,湖南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65-196页。

37 (清)李卫:《奏报酌定保定府莲池书院经费事》,乾隆元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04-01-35-0882-020.

院，暂由司库公项内借垫。六年(1741)，书院每年所需经费达1700余两，直隶总督高斌奏请将王钧等捐存营田工本剩余银中提出2万两，交长芦盐运使交盐商以1分生息，解交藩库，每年得息银2400两，“以充书院膏火及普济堂之用”，但实际上新添置的生息银两主要为莲池书院所用。<sup>38</sup>如此，莲池书院的经费结构在乾隆六年(1741)前后，学田收入占比由100%骤降至11.11%，见图1。

〈图 1〉直隶莲池书院经费结构的演变



综合而言，置田收租不再是省会书院唯一或主要的经费筹措办法，发商生息、拨给公项、捐给养廉等方式显得更为普及，省会书院的经费结构走向多元化发展。

导致学田地位下降的原因，与传统农业经济的缺陷有关。河南巡抚胡宝琮曾比较过置田与发商生息两种经费模式的优劣。在他看来，置田收租具有种种不便，“实不若交商生息之简便无扰”，其理由可归纳为三点。一是书院经费的筹添一般急需见效，田产有限的市场流动性导致其购买需要“恰逢时机”。二是由于传统农业本身抗灾害能力差，收入不能稳定，与省会书院制度化以后，每年需要定额的经费来源的实际需求产生矛盾。三是对于学田的管理、

38 (清)沈起元：《奏为酌筹崇正书院等生息银两以资膏火事》，乾隆八年六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04-01-38-0181-013。



额租的征收非常不便，从而为地方政府带来额外的行政成本。<sup>39</sup>基于以上考虑，多数省会书院不再依赖学田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而发商生息的财产经营模式则备受青睐。

当然，发商生息经费模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发商生息能够顺利推行的基础是商人的经营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并且可以获取足够的利润。当这一基础出现问题时，书院的生息银两也会面临积欠。尤其是嘉道间，因社会经济凋敝，生息银积欠、降息普遍出现。各书院发商时约定的利率也普遍下降，如鳌峰书院在道光十八年(1838)所置生息之项，本银3600两仅能获取7厘之利。<sup>40</sup>因此，各省会书院在嘉道间虽有逐渐累积而愈加庞大的生息本银，但其实际收入并未显著增长。

3. 省会书院的经费优势

雍正十一年(1733)以后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的省会书院得益于多元化的经费结构，收入水平得以大幅提高，经费规模已跃升至“数千两”的量级。充裕的办学经费是提高办学水平的经济基础，奠定了省会书院一省文化教育中心地位。嘉庆、道光间各省会书院的经费收支数据，详见表3。

〈表 3〉嘉庆、道光间各省会书院经费收支表<sup>41</sup>

收入区间	书院	收支情况
0-999两 (3所)	海东书院(乾隆八年)	岁收约350两
	金台书院(嘉庆二十三年)	岁收400两
	沈阳书院(嘉庆二十三年)	岁收约873两

39 (清)户部：《为豫省生息银两由》，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档号：207652-001。

40 (清)来锡蕃：《鳌峰书院纪略》，《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第503页。

41 赵伟：《清代省会书院制度研究(1644-1850)》，湖南大学202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23-224页。

1000-1999两 (3所)	贵山书院(道光二十六年)	岁支1100两
	江汉书院(嘉庆九年)	岁收1800两
	关中书院(乾隆四十八年后)	岁收1846.595两
2000-2999两 (6所)	秀峰、宣成书院(乾隆四十八至道光三年)	岁收2052两加租谷
	大梁书院(嘉庆二十三年)	岁收2400-2685.639两
	莲池书院(乾隆八年)	岁支2000余两
	兰山书院(道光八年)	岁收约2299两
	锦江书院(道光十二年)	膏火岁支2299-2309两
	敬敷书院(道光二年)	岁支2800余两
3000-3999两 (5所)	端溪书院(道光二十八年)	岁支3000两有零
	岳麓、城南书院(嘉庆七年)	岁收3135.612-3149.55两加租谷
	豫章书院(道光十年)	岁收3836两零加租谷
	越华书院(道光九年)	岁收3412两
	钟山书院(太平天国战前)	岁支约3431两
4000-4999两 (3所)	晋阳书院(道光四年)	岁收4503.32两
	涿源书院(道光二十一年)	岁收4090.736两
	五华书院(道光十九年)	岁收约4193.211两加租米
5000两以上 (4所)	粤秀书院(道光二十二年)	岁支5199.9951两
	紫阳书院(乾隆三年)	岁收最高5270两
	敷文书院(道光十六年)	岁收5160两以上
	鳌峰书院(嘉庆十二年)	岁收5736.86两

嘉庆、道光间, 各省会书院的经费在前朝的基础上普遍增长, 收入在2千两以下的书院有6所, 已有4所书院的经费达到5000两以上的水平, 收入最高者与最低者之间仍相差悬殊。

省会书院的主要经费开支大致可分为教学类、管理类和事务类三个方面, 其多寡直接影响了教育活动的开展水平。教学类开支包括院长的束修薪水、生徒的膏火课奖、考课卷资饭食等, 管理类包括监院薪水、杂役工食等, 事务类包括祭祀、岁修、器物的修造维护等项经费。

在省会书院诸多经费支出项目中, 以供给生徒和院长的束修膏火为大宗。省会书院的膏奖待遇水平决定了生徒在院肄业时是否有能力支撑其个人乃至家庭的生计, 这又是决定省会书院是否具有足够吸引力来动员全省范围

内的优秀士子前来肄业的重要保障。院长的待遇水平决定了省会书院能否在全国范围内聘请高水平的掌教者，尤其在文风不盛，难以就近聘请名师的地区，院长待遇的高低更显重要。

在政策、经费等优势资源的支持下，省会书院稳固了一省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其生徒的科举成绩更是独步省内。福建的乡试解额为85名<sup>42</sup>，而鳌峰书院每科乡试中式者一般都在20名以上，如道光五年、八年(1825、1828)分别中式25、22名。<sup>43</sup>边远的云南五华书院成绩更为突出，云南省的乡试解额为54名，五华书院“每秋榜，中式率三十人，少亦二十人云”<sup>44</sup>，占比达50%左右。

## 五、余论:19世纪借助省会书院制度推行的教育变革

明清以来，省会书院扮演了官方层面完善官学体制架构、宣扬朝廷文治的角色，其经费结构及财产经营方式随着王朝财政体制的变革而发生新的变化。

雍正朝耗羡归公财政制度改革，使得各省公共事务可以合法得到公项经费的支持。在雍正十一年(1733)令各省建设省会书院的谕旨颁行后，省会书院经费成为财政经费的正式支出之项。在财政经费的支持下，各省会书院的办学规模得以扩张，传统的依赖农业经济收入的学田经费模式逐渐式微，不再作为省会书院的主要经费来源。而发商生息式的资本放贷模式迅速兴起，辅之以捐给养廉银、拨置充公官产等经费筹措办法，省会书院形成了新的经费结构，清代文化教育体制随之伴生出新的变化。

作为补充明清官学体制中省一级的空白而存在的省会书院，借助多元化

42 有关各省乡试解额的数据皆来自李世愉、胡平《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7页。

43 (清)来锡蕃：《鳌峰书院纪略》，第471、480-481页。

44 李春龙(2007)，王珏点校：《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第6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第527页。

的经费来源渠道, 经费总额得以大幅提升, 在增加录取名额的同时, 还能将招录范围从生监扩展到人数更为庞大的童生群体, 这是其超越地方官学而跃居通省最高学府地位的有力保障。同时, 省会书院以其优厚的经济待遇而有条件面向全国选聘知名之士担任院长, 通过省会书院院长的选聘渠道, 一张全国性的学者交流网络得以构成。在这一网络中, 处于文化高地的江南属于学者的输出地, 当地盛行的学术文化随之并对外传播, 并借助省会书院这一区域文化中心而有了进一步扩散的可能性。

以往的研究曾提出“书院官学化”的命题, 来描述书院的人事任命、经费管理、教学考课等被官方控制的历史过程。<sup>45</sup>但从传统国家教育制度的自我演进过程来看, 完善教育层级、增强政府管理、增加教育财政经费投入是教育近代化的必由之路。<sup>46</sup>因此, 对“书院官学化”问题不能简单持否定态度, 也应注意到省会书院制度在传统国家教育体制自我演进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事实上, 19世纪西方对中国形成冲击以前, 中国教育体制就借助省会书院制度而发生了内部变革。嘉庆、道光之际, 扬州学派阮元以督抚身份主政浙江、广东, 先后创设经精舍、学海堂, 形成新的文化教育格局, 这是不同于教育体制“全盘西化”的另一条变革之路。对这一话题的进一步研究, 还有待研究者的持续关注。

45 书院的官学化是书院史研究无法避开的重要议题。最早提及书院官学化的是陈东原, 他在1933年《明代之科举与教育》中称: “书院当元代时, 业已受了官学化, 自然入明以后, 此风更甚。见陈东原: 《明代之科举与教育》, 《学风》, 1933年第1-2期。

46 吴式颖、阎国华在其主编的《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中提出, “西方近代教育行政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国家不断参与教育、干预教育、投资教育和重视教育的历史”。关晓红亦认为这是“教育近代化进程的普遍趋势及一般规律”。分别见吴式颖、阎国华主编: 《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近代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7年, 第864页; 关晓红: 《晚清学部研究》,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0年, 第272页。

### 【参考文献】

- 陈谷嘉(1997), 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明)王宗沐(1995), 《作新桂林书院呈》, 《敬所王先生文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111 册, 济南: 齐鲁书社
- (清)梁廷枏(2018), 《越华纪略》, 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第83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朱汉民·邓洪波(2017), 《岳麓书院史》,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 (明)陈伯献(1967), 《重修宣城书院立田记略》, 嘉庆《临桂县志》卷14, 台北: 成文出版社
- (明)岳和声(1995), 《设置讲课簿由》, 《共学书院志》, 《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0册,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明)张自烈编(1996), (清)廖文英补:《正字通》,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 (清)索尔讷等纂修(2009), 霍有明、郭海文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明)吴道行(2012), (清)赵宁等修纂, 邓洪波、杨代春等校点:《岳麓书院志》, 长沙: 岳麓书社
- 邓洪波(2012), 《中国书院史》(增订版),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 [美]曾小萍著, 董建中译(2020), 《州县官的银两: 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清)黄登瀛(2019), 《端溪书院志略》, 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第92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 李春龙(2007), 王珏点校: 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第6册,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Abstract

## Research on Property Management of Sunghwei Academ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o wie\*

Chinese academies developed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new changes gradually took place in the way of property management.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cademies built by provincial officials in the Ming Dynasty were established spontaneously by the localities,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obtain stabl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or local governments. Therefore, their property management continued. The traditional funding model for school field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is to obtain stable land rent income through the purchase of school fields. After the Yongzheng Dynasty of the Qing Dynasty implemented the financial reform of "returning consumption and envy to the public" and the official promulgation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cademies system, each province had its own public funds for public expenditure, and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cademies became the expenditure items of local funds, and its funding structure became diversified. , new changes also took place in the way of property management, the mode of funding for school fields tended to decline, and capital lending and earning interest became the main source. Since

---

\* Lectur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Humanities, Nanchang University

then, the funds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academy have become more abundant, and the status of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center of the province has been establishe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19th century. foundation.

Key word : Sunghwei academy, property management, education funding

논문 투고일: 2022. 10. 25 심사 완료일: 2022. 12. 09 게재 확정일: 2022. 12. 16